

秦漢問題研究

张传玺 著





秦汉问题研究

张传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秦汉问题研究
张传玺 著
责任编辑：何瑞田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怀柔王史山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168毫米32开本12.5印张320千字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4,500册
统一书号：11209·39定价：2.50元

目 录

研究方法·····	1
怎样研究秦汉史·····	1
翦伯赞著《秦汉史》校定本序·····	12
土地制度·····	17
汉以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生和确立·····	17
两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32
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制形成的三个阶段·····	55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国有土地问题·····	77
从“授民授疆土”到“衣食租税”·····	101
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	109
契约问题·····	140
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的四个阶段·····	140
中国古代契约形式的源和流·····	167
中国古代契文程式的完善过程·····	190
社会经济·····	209
秦代的社会经济·····	209
论秦汉时期三种盐铁政策的递变·····	221
两汉大铁犁研究·····	249
地理、交通·····	275
秦代北京地区的郡、县、关·····	275
从鲜于璜籍贯说到两汉雍奴故城·····	279
释“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	302

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	309
人物、事件	
就郭沫若评价秦始皇答问	318
应当正确地评价王绾	325
“更名民曰黔首”的历史考察	330
关于“章邯军”与“王离军”的关系问题	336
项羽论评	342
冯夫人本事	355
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	358
东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铭考释	368
 后 记	 394

研究方法

怎样研究秦汉史

秦汉史包括了秦、西汉和东汉的历史，时间共有四百多年（公元前221—公元189年）。^①这段历史在我国古代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可是近年来，有不少青年同志不愿研究这段历史。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秦汉史的有关文献的文字太深，阅读不易；二是有关秦汉史的史料太少，深入困难；三是秦汉史“人人通”，难成专家。这些看法虽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总的说来，是很不正确的。所以如此，是由于对秦汉史的研究不甚了解所致。应当说：秦汉的文献史料是比较完善的；文字也比较简明易懂，至少比清朝的王船山、黄梨洲和民国时期的章炳麟等人的著作并不难读，可能还要好读一些；秦汉史料在文献之外，还有极其丰富的考古资料；秦汉史上有待研究的问题很多，但研究者并不多，人力很不足。因此，我认为有志于秦汉史的青年同志完全应当抛弃顾虑，大胆地参加到秦汉史研究者的行列中来。只要肯下苦功，就能够深入下去，大有作为。

应当怎样研究秦汉史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位有关学者有各自的经验或体会。但总的说来，大家的认识是不会相差很大的。我在这里就这一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点滴体会。

^① 东汉在名义上存在到公元220年（献帝延康元年）；可是至189年灵帝死后，已名存实亡。汉献帝起初是董卓手中的傀儡，后来是曹操手中的傀儡。此后的历史，归入三国时期。

一 应当了解研究意义，明确研究目的

研究任何一段历史，都应当了解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意义，明确研究的目的。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

1. 要了解研究秦汉史的意义，也就是要了解研究秦汉史的重要性，首先要了解秦汉史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大转变的时期，许多问题在学术上都是重要的课题。例如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就很重要。近五十余年来，在我国长期进行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及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无论哪一派或哪一家，几乎没有不把这一问题作为重点进行探讨的。仅就此事，已足以说明秦汉史的重要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是我国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诸侯割据混战走向统一，并建立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也是一个飞跃发展的时期，土地国有制瓦解，私有制确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文学、艺术日益兴盛。这一时期产生的许多重要制度和政策，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或出现的重要人物，对当时和后代，都有或都曾发生过或大或小的影响。可以这样说，秦汉时期是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文化的总结和升华时期，又为此后两千年的历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因为这样，所以不少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不论其为研究先秦史，或是研究魏晋、隋唐史，甚至研究明清乃至近现代史，必要也应当对秦汉史有一定的了解。否则，他的研究将难深入，或会遇到不少困难。这就是为什么秦汉史会成为所谓“人人通”的主要原因。可是，所谓“人人通”，并不是说人人都是“秦汉史专家”，只是说不少人对秦汉史有些了解；实际是以这段历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为数并不多；至于堪称之为“秦汉史专家”的人，那就更少了。正是因为这样，直到目前为止，秦汉史的研究水平并不很高，许多重要问题并

未深入研究，还有不少重要问题长期无人问津。

2. 明确研究秦汉史的目的，就是要明确研究秦汉史是为了什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工作者，研究任何问题，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不要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更不应为了谋取个人的名利而研究；而应当是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繁荣、发展祖国的学术而研究。研究秦汉史也应是这样，应当是为了建设祖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例如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规律，可以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服务；研究这一时期的制度、政策、人物等等，总结其经验教训，可以为今天的建设提供借鉴；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可以丰富发展今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有些人的研究是专门为了自己的名利，而是说研究者应当明确研究目的。因为学术研究的课题很多，有难有易，有的有价值，有的无甚价值，或很没有价值。在研究上采取避难就易、避重就轻的态度是存在的。要真正解决点问题，尤其是要研究一些有重要价值的问题，要做出点开创性的贡献来，不付出相当的代价，不做出必要的牺牲，是不行的。因此，这就要在学术研究的态度上，提倡事业心，提倡共产主义的献身精神。

研究意义了解了，研究目的明确了，研究的动力也就产生了。只要精力集中，方法对头，就可以做出成绩来。

二 应当了解史料范围

“秦汉的史料太少”之说，不符合事实。我国古代的史料“浩如烟海”，这是尽人皆知的。但不能因此而要求每一具体朝代的史料都“浩如烟海”。印刷术发明以后，如宋、元、明、清，文献史料是很多的。要求在隋、唐以前各代的文献史料都是这样多，就不切实际。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隋唐以前的史料太少，甚至认为少到无法

进行史学研究，这种观点就很不正确。应当这样说，各个朝代有各个朝代的史料。就秦汉来说，文献资料固然比后代少一些，但有关的考古资料之多，其史料价值之高，又是后来的任何朝代所不能相比的。这里将秦汉的主要史料的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1. 文献资料

文献资料以“四史”为主，此外还有其他史书、《汉魏丛书》以及诸子、文集等。

(1) 四史——“四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总称，是研究秦汉史的基本资料。《史记》是西汉中期的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第一部体例完善、内容丰富的史学著作。记事上起黄帝，下迄于当代（汉武帝时），时长共约两千多年。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书中除记述了历代王朝的兴亡、帝王将相的成败之外，又为不少学者、医生、商贾以及其他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代表性人物立传，还为天文、历法、礼乐、水利、工商、少数民族及外国等，各做了专篇论述。文章质朴，文字生动。全书略于春秋以前，详于战国以后，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我国上古时期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又比较具体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正在形成中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面貌。《汉书》是东汉前期班固撰写的，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分为一百二十卷。《汉书》仿《史记》，体例完整，内容丰富，全面具体地记述了西汉二百三十年间的主要政治、经济、文化、事件、人物、民族、地理等等，资料翔实，撰述严谨。书中又收录了许多有关的重要诏诰和疏、议、文章等，史料价值都很高。《汉书》有西汉“实录”之喻。《后汉书》是南朝宋时范曄撰写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所记为东汉二百年间的重要史事和人物等。原书只有纪、传，无表、志。南

朝梁时,刘昭把西晋司马彪撰的《续汉书》中的“八志”收入本书,并为之作注。北宋时,合刊为一书,共为一百三十卷(一百二十篇),是研究东汉史的基本资料。《三国志》是西晋陈寿撰写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所记为三国时期近百年间的重要史事和人物。全书分为魏、蜀、吴三部,共六十五卷。无表、志。南朝宋时,裴松之作注,博引群书,注文多出本文数倍,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三国志》和裴注是研究三国时期近百年历史的基本资料。对研究东汉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 其他文献资料——其他文献资料很多,可以说在经、史、子、集中都有不少。堪称为第一手资料的有《东观汉记》、《汉纪》、《后汉纪》、《七家后汉书》、《汉官七种》、《说文解字》、以及《汉魏丛书》、《全秦文》、《全汉文》等。有些著作的史料价值很高。如《盐铁论》一书,详细具体生动地记述了西汉昭帝时召开的有关盐铁政策的会议的辩论情况,与《史记·平准书》、《货殖列传》和《汉书·食货志》等篇对照研究,可以对西汉前中期的政治、经济情况,尤其是对当时的盐铁政策,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此外,《水经注》、《资治通鉴》和《通鉴纪事本末》中的有关部分,以及《全汉诗》、《秦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二十五史补编》中的有关部分,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或参考价值。

2. 考古资料

考古资料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一般考古资料——一般考古资料是指考古发掘的遗址、墓葬、出土器物及有关遗迹等。自清末以来到现在的八十年间,已发表于报刊的有关秦汉的文物与考古的文章或资料大约有两千篇之多,份量较大的发掘、研究报告或专著尚不在内。主要内容有城市、宫殿、住宅、坞壁、冶炼场等的遗址,帝王、贵族、官僚、地主和农民、刑徒、奴婢的墓葬,出土的铜器、铁器、金银器、漆器、兵

器、礼器、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车马具、生活用具、丝织品、衣物、工艺美术品等。这些遗址、墓葬和器物不同于一般文献记载，只给人以抽象的概念；这些资料是具体、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有关历史的实际，其史料价值是极高的。若干年来，《文物》(原名《文物参考资料》)和《考古》(原名《考古通讯》)两杂志经常并比较及时地为考古和史学研究者提供一定数量的新的考古发掘资料或研究成果。此外，陕西、河南、湖北等不少省份也创办了这类刊物，按期发展有关本省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情况。江西省出版的《农业考古》，也是一份很重要的杂志。《考古学报》则是一份研究性杂志，更专门一些。这些杂志经常刊载的有关秦汉文物、考古方面的文章或资料，对秦汉史研究都有很重要的史料或参考价值。

(2) 秦简与汉简——秦简与汉简的大量出土，在某种意义上说，扩大了或说是增加了秦汉史料的“文献资料”。已汇辑成册而史料价值较高的，有五部：(一)《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出版，包括了释文和注释。这批秦简是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发现的，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五支，另有残片八十片。内容以法律为主，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战国末年和秦朝前期历史的宝贵资料。(二)劳干撰《居延汉简考释》，(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此两书的汉简来源，是1930年西北科学考查团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共收得汉简一万余支。劳干在抗日战争时期，对这些汉简进行了分类研究，撰有《释文》与《考证》，连同《图版》，共为三个部分，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1949年，又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铅印再版。此后，又经劳干整理，在台湾重印出版。“甲乙编”是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该书将1930年出土的居延汉简，包括图版与释文，在经过长期检查、研究之后，全部刊录。内容分为图版、释文、附录、附表四个部分。图版共四七五版，释文一律按原简号顺序排列。纠正了过去出版物中的一些错误。所附

《额济纳河流域汉代亭障分布图》等，为研究使用这批汉简提供了方便。居延汉简是两汉时期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辖区内的官方文书，大部分属于西汉中期至东汉初年的遗物，内容涉及这两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为研究两汉历史的宝贵资料。（四）罗振玉与王国维合撰的《流沙坠简》，共三册，1914年出版，1934年校正重印。此书系据法国人沙畹书中选录英国人斯坦因在我国敦煌等地盗掘的简牍、纸片、帛书等的照片撰成，共收有五百八十八支（张），另有释文和考释，其中大多系汉简。书中对汉代的屯戍、烽燧等制度的考释较详，史料价值很高。（五）张凤撰《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主要据法国人马伯乐寄给张凤的有关斯坦因第三次所得的木简的照片（为沙畹书所未收）编辑而成，未加考释。亦有史料价值。

此外，考古工作者还于解放以后在居延陆续发现汉简约二、三万支，在甘肃武威县城南磨咀子发现完整的汉简二百八十五支，另有残简二百二十五支。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湖北江陵纪南城凤凰山汉墓中、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都有大量的汉简（牍）出土。这些汉简中有不少有关赋税、徭役、商业、医药、地理等资料，还抄有不少为今天已失传的古书。这些资料对研究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金石文字资料——在西汉的金石文字资料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是碑刻（包括摩崖）。著录两汉碑刻的主要著作有宋洪适的《隶释》二十七卷，收入汉魏隶书石刻文字一百八十三种。后又辑《隶续》二十一卷。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集录汉魏石刻文字的专书。清人马邦玉辑《汉碑录文》四卷，著录汉碑八十四篇，附魏碑三篇。此外，在清人孙星衍、邢澍合撰的《寰宇访碑录》、王昶撰的《金石萃编》、冯云鹏、冯云鹗合撰的《金石索》等著作中，都收录了不少属于秦汉时期的碑刻或其他金石文字资料。

其他文字资料比较有史料价值的是封泥，就是用于公文或书信

上的印模，其作用与后代的火漆封记相同，这是研究汉代职官制度的宝贵资料。清人吴式芬、陈介祺合辑的《封泥考略》一书，共收录汉代官私封泥八百四十九枚，并加考释。今人周明泰辑有《续封泥考略》六卷，《再续封泥考略》四卷，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此外，为数巨大的汉画像石和画像砖，大量地刻绘了汉代的农业、手工业、狩猎和官僚、地主宴饮、出行及战争等场面，都是研究两汉历史的宝贵资料。

三 应当了解已有的研究状况

作为一个秦汉史的研究者，应当经常关心和了解学术界对于秦汉史已有的研究状况。对于当前的研究状况应当了解，对过去的研究状况也应当了解。例如近数十年来，学术界对秦汉史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还应怎样做，这是应当心中有数。

我国对于秦汉史的研究，在清末民初已经开始了。自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以后，更推动了这一研究。从那时到现在，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在内，已发表于中文报刊的有关秦汉的论文和资料约有一万余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民族、中外关系、历史地理等等各个领域。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有学术价值或重要参考价值的。当然，这些文章不仅数量大，而且历时很长，又极分散。旧社会出的报刊印数既少，屡经毁损，很难寻求。今日之台湾，如天地悬隔，香港的地位也属特殊，两地的报刊一般人都不易查到。即使今天大陆上的报刊，可以说到处可见；可是要集中有关秦汉史的文章，也非易事。因此，要了解若干年来人们对于秦汉史的研究状况，必须借助于工具书。现已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的《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上、下编）和第二编（上、下册），复旦大学历史系等单位编的《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上、中、下册）等，其中都收有属于秦汉的大量的文

章。我与胡志宏、陈柯云、刘华祝三同志合编的《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共收文章一万二千余篇,其中大部分是属于秦汉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中外关系、历史地理,以及考古、文物等各个领域。文章收自国内(包括台湾和香港)的一千二百四十多种中文报刊,时间约起自1900年,止于1980年。本书为从事本段历史的教学和研究的同志检阅前人的成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我们不仅要了解国内(包括台湾和香港)同行的研究状况,还要了解外国同行的研究状况,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研究状况。外国同行的研究,对我们也会有重要的启发或参考价值。

四 应当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历史学是一门党性很强的学问。因此,研究历史,就有一个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不能认为,研究历史只要有了资料,就一切俱备、万事大吉了。实际情况不如此简单。资料是重要的,但资料却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中留下来的历史资料,绝大部分是奴隶主、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留下来的;都带有他们固有的阶级偏见,或是说打上阶级的烙印。此外,由于各种原因,即使同属于一个阶级的史学家或知识分子,他们所留下来的资料,或对同一问题所表示的观点,有的也有很大的差别,甚至有正确与谬误之分。例如人们很熟悉的两汉大史学家所谓“班、马”,即班固和司马迁,其思想、观点就有很大的差别。宋人倪思撰《班马异同》三十五卷,多从辞句方面考其异同;而其思想、观点的异同更是一个大问题,值得研究。因此,要能正确地驾驭、处理、使用资料,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不行的。这就需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创造性的成就来。

当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做指导，不能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一些论述，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当标签使用；而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具体分析史料，揭示历史实际，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改造旧思想旧观点的问题，也就是有一个改造阶级立场的问题。就是要改变地主、资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逐步确立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当承认在自己的身上，一定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旧的立场、观点的影响，为改造自己具备主观上的要求。其次，要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要学习基本原理，如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进而选读专著，包括基本理论和史学名著。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等，都是重要的基本理论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及《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都是属于解剖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或一种时代思想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国农民战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则是着重于剖析一个事件或评价一个人物。读了这些著作，不仅可使我们提高理论修养，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从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何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历史，对有关事件和人物，做出正确的论述或评价。

五 按照计划进行学习研究

读书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计划，按照计划进行学习研究。书要分出主要次要，所谓主要次要，对史料来说，是以史料价值的高低

为标准。主要的书应当先读。读书不要单打一，要“精读”与“浏览”相结合。如“四史”，必须精读，而且要“熟读”，通过这一方法掌握住有关秦汉史的基本史料。翦伯赞同志“八读《汉书》”一事，在燕园（北京大学校园）传为佳话。容易阅读或史料价值不很高、但必须要读的著作，可以“浏览”，以求在较短的时间内，或用一些零散的时间，涉猎较多的书籍。这样做，可以了解有关问题的研究情况，扩大知识范围，或为进一步精读做准备。如清人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劄记》等，都可浏览。学习理论也可采用这样的方法。

进行科学研究也要有计划，选题就要慎重，题目要有意义、有价值，大小得宜。对秦汉史来说，研究任何具体问题，都要最大限度的占有资料，甚至应当穷尽已有的资料，包括文献和考古资料；还要尽可能多的查阅一下前人已发表的有关文章或专著，要尊重前人的劳动，虚心接受前人已有的成果，在前人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

1982年5月4日初稿，1984年6月28日修改稿。

翦伯赞著《秦汉史》校定本序

本书是翦伯赞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撰写的，原题《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1946年7月、1947年6月，先后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和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当时，翦老计划写一部八卷本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史》；第四卷，《隋唐五代史》；第五卷，《宋辽金元史》；第六卷，《明清史》（到鸦片战争前）；第七、八卷，《近代史》。第一卷在1944年4月，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第三卷自抗战胜利后开始写作，至解放初，虽已写成二十余万字，但未做进一步的加工，亦未出版。其他各卷当然更只是一个计划了。我们这次对第二卷进行整理校订，考虑到《史纲》写作的实际情况，接受了同志们的建议，决定以原本的副题《秦汉史》为校定本的书名。

翦老决定写一部中国通史，是在1933年。可是那时“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方炽，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已侵占了我国的领土东北，他需要参加这两个方面的斗争。后来又用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撰写名著《历史哲学教程》一书。致使通史工作长期处于收集资料的阶段。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翦老又投身于伟大的“救亡”运动中。这年九月，他由南京回到长沙，和吕振羽等同志创立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开办俄语补习学校，主编《中苏》半月刊。他又与吕振羽、谭丕模、李仲融等同志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及政治训练班、讲演会等，还在南迁的北平民国大学教书，宣传、动员抗战。此时他的通史工作完全停顿。1938年冬至1939年冬，翦老为了斗争的需要，由长沙先后转移到沅陵、溆浦。1940年2月，又